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十四編

林慶彰主編

第2冊

《詩經》教本考論

張蕊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詩經》教本考論／張蕊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 101〕

序 2+ 目 2+174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四編：第 2 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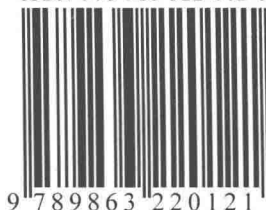
ISBN：978-986-322-012-1（精裝）

1. 詩經 2. 研究考訂

030.8

101015182

ISBN-978-986-322-012-1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十四編 第二冊

ISBN：978-986-322-012-1

《詩經》教本考論

作 者 張 蕊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十四編 34 冊（精裝）新台幣 56,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詩經》教本考論

張 蕊 著

作者簡介

張蕊，1971年生於山東濟南。分別於1994年、2002年、2005年在北京師範大學獲得教育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現為中國傳媒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從事教育歷史與文化研究和高等教育研究。鍾情於中國古代教育史研究，碩士論文《論科舉考試中的詩賦取士》，博士論文《〈詩經〉教本考論》。

提 要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從先秦到清末，一直作為教化修身的教本被世人諷誦涵泳，形成了古代教育史上特有的「《詩》教」傳統。本文以《詩經》的產生作為研究的邏輯起點，探討《詩經》教本的歷史發展演變過程，力圖揭示《詩經》兩千多年歷史適應性的背後動因，藉以對當前經典誦讀熱中正確地理解傳統文化提供一個解讀視角。

《詩》是周代「采詩觀風」制度的成果，從成書開始即為大師教瞽矇的詩樂教本，繼而被選作大司樂教國子的成才教本，孔子整理後作為「六藝」之一傳授弟子，上博簡《孔子詩論》是當時的教本。《詩》三百在漢代地位上升，被稱為《詩經》，立於太學學官並由博士傳授弟子，形成了《魯詩》、《齊詩》、《韓詩》、《毛詩》四家傳授系統，各家均以本派經師的《詩經》學著作作為教本，謹守師法家法。從唐代開始，經學教育與科舉考試緊密相聯，相互作用。在科舉考試統一標準的要求下，唐太宗時期由孔穎達主持編訂《毛詩正義》，成為全國統一的《詩經》教本。宋代熙甯興學中，王安石改革科舉考試制度，編撰《詩經新義》作為評判士子《詩經》經義的標準。隨著理學成為我國古代社會後期的主流意識形態，朱熹的《詩集傳》在元代被官方指定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用書，明清兩代均沿用此制。到明成祖時，在《詩集傳》的基礎上，朝廷組織編撰《詩經大全》作為科舉考試的教材。明清時期，出現了大量指向科舉考試的《詩經》學習參考書。

從先秦到清末，《詩經》教本經歷三次大的歷史轉變：從原典教本到注釋教本，從多家教本到統一教本，從學術著作到應舉專書。同時《詩經》在各歷史時期體現了不同的教育價值：先秦時期具有全面修養的教育價值，漢唐時期具有政治教化價值，宋代以後則以倫理教化價值最為突出。隨著明清時期科舉考試的程式化，其教育價值出現了異化，成為「場屋之資」。但《詩經》中蘊涵的禮樂教化精神是貫穿始終的，並塑造了中華民族「溫柔敦厚」的文化性格，這正是《詩經》的現代教育價值所在。

序

詩書禮樂，是傳統中華文明的代表。以「詩」打頭，專指《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經孔子修訂成書，成為古代最重要的經典教材之一。無論是官宦、學者、文士，如果不通曉《詩經》的話，就缺乏交往和行文的基本功，故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自漢代尊崇儒學後，《詩》學和《詩》教作為學術和教育主幹的組成，兩千年來長盛不衰。

近代以來，《詩經》也和其他儒家經典一樣，恢復了普通典籍的本來面貌。《詩經》集古典詩歌的粹，其許多篇目仍被廣泛傳誦，甚或被選作語文課閱讀欣賞的課文。除專門的經學研究外，對《詩經》的研究基本上在文藝學和文學史領域，對其作為儒家經典教材的歷史研究則很少有人問津。另一方面，中國古代教育史研究多集中在教育制度、設施和教育思想、理論的研究上，對教育內容及教材的研究則不被注重，大概也是因為史料收集和解讀難度較大的原因吧。張蕊所著《中國古代大學教材：〈詩經〉教本考論》，既充實了《詩經》研究的一個薄弱領域，也充實了教育史研究的一個薄弱領域。

作者治學認真樸實，擅長文獻的檢索和考證。從碩士階段到博士階段的學習，不以功利所導，不為物欲所動，一直執著於《詩經》的研究，所下功夫不可謂不深厚。該書從教材研究的視角出發，系統考查了從先秦到明清的《詩經》主要教本，分析其發展和流變，探討《詩經》教育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價值和適應性。該書總結了發展歷程中經歷的三個大的轉變：從原著到注釋，從多家釋《詩》到綜合統一，從經學研究到科舉應試。這不僅是《詩經》教育發展的脈絡所在，也可看作是古代儒家經典教材發展演變過程的具體表

現，由此得窺經學教育的一般規律。

全書以積累豐富的文獻史料為基礎，闡述了各個歷史時期的《詩經》教本的內容、樣式、特點、功用等方面的差異和變遷，可謂言而有據，論之成理。書中採用了《孔子詩論》這一最新的考古遺存，使《詩經》教本發展鏈上的先秦一環得以補全，這也是對《詩》學研究的一個貢獻。

中國古代《詩》教所具有的「溫柔敦厚」的教化功能，對中國人平和、寧靜、含蓄、內向等民族性格特徵的養成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當前，為實現構建和諧社會的遠大目標，我們更需要汲取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的養分。同時，希望此書的問世，能推動對其他古代經典教材的深入研究，更好地繼承和利用這筆寶貴的文化遺產。

俞啓定



目

次

序

導言 作為經學教材的詩歌總集	1
一、從《詩》到《詩經》	1
二、《詩經》研究的三種視角	2
三、研究範圍	7
第一章 先秦時期的《詩》教本	11
第一節 大師教瞽矇：詩樂教本	12
第二節 大司樂教國子：成才教本	19
第三節 孔子教弟子：修身教本	27
第四節 《孔子詩論》：孔子教《詩》記錄	39
第二章 漢代的《詩經》教本	51
第一節 漢代的政治課本	52
第二節 《詩經》的考察標準：師法家法	54
第三節 《魯詩》教本：謹嚴近真	61
第四節 《齊詩》教本：咸非本義	66
第五節 《韓詩外傳》：引事明《詩》	72
第六節 《毛詩》教本：風動教化	79
第三章 唐宋時期的《詩經》教本	95
第一節 《毛詩正義》：科舉考試統一教本	95
第二節 《詩經新義》：新學改革思想教本	106
第四章 元明清時期的《詩經》教本	117
第一節 《詩集傳》：理學教本	117
第二節 《詩經大全》：取士教本	133
第五章 《詩經》教本的歷史演變	143
第一節 從原典教本到注釋教本	143
第二節 從多家傳《詩》到統一教本	150
第三節 從經學研究著作到應舉書目	152
第六章 《詩》教——變與不變	157
參考文獻	161
後 記	173

導言 作為經學教材的詩歌總集

《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共三百零五篇，收入了從西元前十一世紀至前五世紀共五百多年間的詩歌，分《風》、《雅》、《頌》三個部分。《風》為地方樂歌，包括《周南》、《召南》、《邶風》、《鄘風》、《衛風》、《王風》、《鄭風》、《齊風》、《魏風》、《唐風》、《秦風》、《陳風》、《鄆風》、《曹風》、《豳風》等十五國《風》，凡一百六十篇，主要反映周朝社會生產、生活、戀愛、婚姻以及民情風俗各種情況。《雅》乃是西周王畿地區之正聲雅樂，用於諸侯朝會，多出自朝臣貴族，共一百零五篇，包括《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頌》多為宗廟祭祀所用詩歌，共四十篇，包括《周頌》三十一篇，《商頌》五篇，《魯頌》四篇。從內容可以看出，《詩經》廣泛反映了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中國古代文化和智慧的結晶，因而被譽為古代社會的人生百科全書。

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詩歌藝術發達，詩集數量眾多，但是《詩經》地位可謂「無出其右者」，再也沒有一部詩集能像《詩經》一樣受到如此尊崇：自先秦至清末，從天子到士民，將《詩經》看作教化修身的典籍而不斷地諷誦涵泳了兩千多年，以致形成了我國特有的「詩教」傳統，塑造了中華民族「溫柔敦厚」的文化性格。

一、從《詩》到《詩經》

「經」字在中國古代具有特殊的含義，特別是西漢以後，特指帶有神聖意味的經典。現在的《詩經》，在先秦稱作《詩》或「《詩》三百」，是眾多文獻典籍中的一種。如《論語》中記載，「《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

邪。』」〔註1〕又如「不學《詩》，無以言」。〔註2〕在《左傳》、《國語》、《孟子》中均稱為《詩》。如《孟子·離婁下》：「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孔子和莊子等先秦諸賢大都給予《詩》這種文獻以很高的地位，列入了他們的教育內容之中。《詩》與「經」最早的聯繫可追溯到與孟子差不多時代的《莊子》。莊子把重要的教材稱為「經」，他說：「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註3〕此時，《詩》被看作六經之一，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這裡的經典，祇是六種文獻。到《荀子》之時，《勸學》篇說：「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詩》包括在荀子所說的經當中。

《詩》從一般的文獻演變為具有神聖意義的儒家經典，則是在漢代獨尊儒術之後。西漢王朝採納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作為儒家典籍，《詩》的地位上升，被稱作《詩經》，成為《詩》、《書》、《禮》、《易》、《春秋》五經之一。據目前所能考知最早題名為《詩經》的，〔註4〕是司馬遷《史記·儒林傳》中所稱「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西漢以後，就普遍稱《詩》為《詩經》了。從《五經》開始，經《九經》、《十三經》，到《四書》、《五經》，《詩經》均為其中重要的一經。《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經部總敘》稱：「經稟聖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一本詩集成為「垂型萬世」的天下公理。

二、《詩經》研究的三種視角

《詩經》從成書開始，即成為人們研究的對象，其研究歷史，可謂時代久遠，成果豐富。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學術思潮的發展，《詩經》研究的目的、方式與角度都發生著變化，概括而言，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為傳統，一類為現代。傳統的《詩經》研究主要是將《詩經》作為儒家經典的經學研究，

〔註1〕《論語·為政》。

〔註2〕《論語·季氏》。

〔註3〕《莊子·天運》。

〔註4〕據洪湛侯：《詩經學史》，中華書局，2002年，頁106。

現代的《詩經》研究更多的是將《詩經》作為詩歌總集的文學研究。

經學視角——儒家經典

自《詩》成為經書，對其進行的研究即成為我國古代的學術主流——經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經學即「對儒家『經典』加以闡發和議論」，〔註5〕《詩經》學就是將《詩經》看作神聖化、政治化的儒家經書，對其進行闡發研究，通過對《詩經》內容的考察訓釋，闡發聖人的微言大義。

漢代的《詩經》研究有今文經學的齊、魯、韓三家詩，在西漢均被立為博士，東漢時古文經的《毛詩》後來居上。各家紛紛通過對《詩經》的研究，闡述各自的思想，為社會政治服務。《魯詩》學派的王式將《詩經》視為諫書，《齊詩》則附會陰陽五行之說，為當時的社會政治服務，《韓詩》將詩句與故事相引證藉以闡發詩義。今文經學的三家《詩》先後亡佚，惟有古文經學的《毛詩》得以流傳至今，《毛詩》包括《詩序》、《毛傳》、《鄭箋》，其中《詩序》主要闡述儒家的詩教思想，《毛傳》則主要是對詩文作簡明的訓釋；《鄭箋》對經文和注釋都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三個部分組成了《詩經》研究的系統，闡述《詩經》的政治和歷史的意義。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天下紛亂，名學、玄學漸興，兼之佛教大盛，但經學仍舊是重要的學術內容。三國時的王肅作《毛詩注》，多申毛駁鄭，《詩經》研究出現鄭、王之爭，兩派都堅持自己所闡釋的是聖人的本意。同時，經學研究中出現了南學、北學之分，「南學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註6〕唐貞觀年間，唐太宗為統一思想，以朝廷的力量統一經學，命孔穎達編撰《毛詩正義》，集自漢至隋《毛詩》研究的大全，成為《詩經》的官方指定用書。就此結束了之前的南學和北學之爭，使《詩經》的經學研究統一在國家意識形態下，加強了《詩經》的權威性和神聖性。因而，有唐一代以至宋朝初期，對《詩經》的研究幾乎沒有什麼異議。

宋代的詩經研究，則應時而變，更注重實證，展開了對漢學義疏的批判，形成《詩經》宋學研究。宋學批判漢學，對《詩經》重新進行研究和闡釋，但是依舊是將《詩經》作為聖人的經書。《詩經》宋學的開山之人歐陽修認為《詩經》經過孔子刪訂，「著其善惡，以為勸誡」，具有體現「聖人之志」〔註7〕的

〔註5〕湯志鈞：《近代經學與政治》，中華書局，1989年，頁6。

〔註6〕《隋書·儒林傳》。

〔註7〕歐陽修《詩本義》卷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教義，從中闡發倫理教化思想。朱熹的《詩經》研究立足於義理之學，認為「此《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註8〕是「無一理之不具」的理學經典，在所著《詩集傳》中，兢兢業業地維護《詩經》的經書權威地位，乃成《詩經》宋學的集大成者。元明兩代的《詩經》研究承襲宋人將《詩經》作爲理學教本的觀點，在理學的範圍內闡述聖人之意。明成祖朱棣時期，令胡廣組織編撰《詩經大全》，頒爲法令，成爲當時具有權威性質的《詩經》解說。明成祖在《大全》的序言中明確表示：「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功可成。」

清代的《詩經》研究，提倡復興漢學，意在以復古爲解放，要求脫離宋明理學的桎梏，打破《詩集傳》的權威性。縱觀這一時期的研究，或側重古文經學，對《詩經》的文字、訓詁、音韻、名物進行了浩繁的考證；或側重今文經學，搜集三家詩的遺說進行研究。還有學者繼續發揮《詩經》的微言大義，爲社會改良服務。這些研究，仍將《詩經》作爲神聖的「經典」看待，祇是在反對《詩經》宋學，力圖恢復《詩經》漢學。

綜上所述，如朱傑人先生所言：「《詩經》從開始，就是作爲經學而不是文學被人們認識和研究的。」〔註9〕

傳統的《詩經》研究，都是將《詩經》作爲聖人經典，認為「經」是聖人所定，其文字深藏著聖人的微言奧旨，其中必有聖人的「修世治道」的至明之理。所以，「經」學的研究都是對《詩經》文字背後的聖人之意的考證。

《詩經》研究專家夏傳才先生對傳統詩經研究的內容總結爲三個方面：訓詁、考證、義理。〔註10〕

訓詁，是訓釋詞語及疏解章句，這是對「經」的最基礎的研究，稱爲小學，包括：訓詁、文字、音韻和校勘。考證，是對《詩經》中的名物、典章制度、歷史、地理和有關內容的考據，版本、輯佚等學術也可歸於這一類。義理，是通過詩旨和內容的闡釋發揮倫理道德思想，無論是漢學的以尊《序》爲本，或宋學的廢《序》解詩，都在貫徹孔子的詩教思想，明顯地表現出它們是經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與這些相結合，還有一些關於詩經學基本問題的

〔註8〕《詩集傳》序。

〔註9〕蔣元見，朱傑人：《詩經要籍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序。

〔註10〕夏傳才：《從傳統詩經學到現代詩經學》，《河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4期。

論說，如關於《詩經》的編訂、流傳、《詩序》、體制、作品時代、地域等等。

所有這些研究，無論是考明字詞，還是闡說義理，其基礎都是將《詩經》看作是聖人的典籍，闡發其中蘊含著的聖人之微言大義。

文學視角——詩歌總集

將《詩經》作為經典來研究固然必要，但是，《詩經》的表現形式畢竟是詩歌，有其文學特徵，因此對《詩經》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牽涉到文學方面。在傳統的研究中，出現過文學研究傾向。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學家曾經分析《詩經》的文學意蘊。到了明代有了比較突出的從經學到文學的轉向，據劉毓慶分析，明代的《詩經》研究「從文學的角度審視這部聖人經典，以群體的力量改變了《詩經》原初經學研究的方向。」〔註 11〕但是，在主觀認識中，仍舊是將《詩經》作為聖人的經典，體會聖人的情感意志，祇是在內容上偏重《詩經》文學藝術方面的特性。

20 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古史辨」派才明確否定《詩經》之「經」的地位，將《詩經》作為「詩歌總集」來研究。

「古史辨」派認為漢代《詩經》學把《詩經》當「經」而不是詩，並在此基礎上展開了對漢代《詩經》學的批判，鮮明地提出了要恢復《詩經》的文學面目。其代表人物有顧頡剛、胡適、錢玄同等。顧頡剛分析了詩樂關係，探討了《詩經》的產生及其性質；對《詩經》的真相及先秦儒家說詩的手段進行了歷史還原，要揭開其千百年來神聖化的面紗。〔註 12〕胡適說：「《詩經》不是一部經典，從前的人把這部《詩經》都看得非常神聖，說它是一部經典，我們現在要打破這個觀念……」並且認定「並不是一部聖經，確實是一部古代歌謠的總集」。〔註 13〕錢玄同致信顧頡剛，要求其將《詩經》好好整理一番：「救《詩》於漢宋腐儒之手，剝下它喬裝的聖賢面具，歸還它原來的文學面具。」〔註 14〕這便是要將《詩經》的研究從經學的附庸地位下解放出來，確立起文學本位的原則。聞一多在分析了從漢到清的詩經研究之後說：「明明一

〔註 11〕 劉毓慶：《從經學到文學——論明代〈詩經〉學的歷史貢獻》，《文學遺產》，2002 年第 5 期。

〔註 12〕 顧頡剛：《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古史辨》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309。

〔註 13〕 胡適：《談談〈詩經〉》，《古史辨》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年，頁 577。

〔註 14〕 《古史辨·論「詩」及群經辨偽書》，見《錢玄同文集》第四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年 6 月，頁 231。

部歌謠集，爲什麼沒人認真的把它當文藝看呢！」〔註15〕

古史辨派開創了將《詩經》作爲「詩歌總集」，從文學視角進行研究的思路，掀起了以現代觀念解讀《詩經》的熱潮，不再把《詩經》看成是具有神聖色彩的經書，使《詩經》的研究領域更加廣闊。胡適曾提出現代《詩經》學的兩條根本性研究方法：一是在比較歸納的基礎上，給《詩經》的文字和文法重作注解；二是涵泳原文，用社會學的、歷史的、文學的眼光對詩旨重新解釋。聞一多用「社會學的」的方法來研究詩經，表示要用考古學、民俗學、語言學等方法把讀者帶到《詩經》的時代。〔註16〕郭沫若採用了人類學的視角研究《詩經》，「以詩證史」是其基本方法。朱自清開始了從文學批評的角度研究《詩經》，其《詩言志辨》分析了有關詩的一些基本範疇。

現當代的研究大多都以文學爲本位，將《詩經》完全看作詩歌總集，研究《詩經》基本問題，如：文字訓詁、作家生平、作品年代、題材、語言、情節等，更多的是對《詩經》藝術特點的研究，把賦、比、興的研究納入文藝學的視野，並成爲中國詩學的一部分。

《詩經》在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中，所被賦予的文化和精神，遠遠超出了一本詩歌總集，承載了深厚的儒家傳統思想，不能僅將其當作文學作品來研究。

教育視角——教本

除了作爲儒家經典和作爲詩歌總集以外，《詩經》在我國古代還發揮著一種重要的功能，並成爲其存在的一種歷史形態，這就是作爲教材進行教授。《詩經》作爲古代官學教育的主體——儒家經學教育的重要內容，成爲士子學習的基本教材。

宋代葉適說：「自文字以來，《詩》最先立教。」〔註17〕《詩經》成書的一個原因就是西周的大師有向樂工教授《詩》的需要；隨後又成爲大司樂教授國子的課本；及至春秋時期，孔子整理《詩經》作爲教材教授弟子，成爲孔門私學的一門課程。

〔註15〕《匡齋尺牘》六閒話，《聞一多全集》（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頁356。

〔註16〕《風詩類鈔》（甲）之《序例提綱》，《聞一多全集》（四），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4年，頁5~94。

〔註17〕《葉適集》卷十二，《黃文叔詩說序》。

聞一多在《匡齋尺牘》之六中認為：「漢人功利觀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的課本。」〔註18〕從漢代開始，《詩經》就一直都作為官學的重要政治課本發揮其教材的功能，祇是在不同的歷史朝代，選做課本的是關於《詩經》的不同著述。

漢代由於獨尊儒術，立五經博士。西漢設今文齊、魯、韓三家博士，並為博士設弟子，傳授《詩經》學。東漢古文經學地位上升，毛詩超過了今文三家詩，並得以在官學傳授。唐代孔穎達編定《毛詩正義》，並頒定為科舉考試的標準用書，成為官學的指定教材。宋代，王安石在改革中，編定《詩經新義》作為科舉考試的評判標準。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年）開科舉，詔令「《詩》以朱氏為主」，朱熹的《詩集傳》成為元代以後《詩經》的主要教本。明成祖時，胡廣主持編定《詩經大全》，以此作為科舉考試的標準，也成為士子求取功名而必讀的教科書。

《詩經》作為教本，從先秦一直使用到清末，歷時兩千多年，在如此長久的時段中，社會、政治、思想在各個時期有明顯不同，而三百零五首詩，何以能一直作為古代社會的教科書？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詩經》的教本又有什麼變化？各個教本又是如何適應當時的社會形態和意識的？又是什麼原因使得《詩經》具有如此廣泛的適應性？本研究在敘述教本的歷史變遷的同時，結合具體的歷史環境，具體分析，試圖對這些問題作出回答。

三、研究範圍

在《詩經》研究史上，有關《詩經》的論著，數以千計，多數都是關於《詩經》的學術研究，或研究訓詁，或校定文字，或剖析文字音韻，或考查名物，或探討山川地理，或討論典章制度，或研究詩文義理。〔註19〕這些《詩經》研究論著，大部分祇是學術研究的成果，能進入官學領域的祇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本研究主要是從教育的角度出發，考察歷史上曾經由官方認定和編定的，作為士子考試和學習內容的《詩經》著述，稱之為《詩經》教本。考察《教本》發展演變的過程，呈現《詩經》作為教本的發展形態，探尋經學教

〔註18〕《匡齋尺牘》六間話，《聞一多全集》（一），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頁356。

〔註19〕洪湛侯：《詩經學史》，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自序

育教本發展演變的特點。

爲此有必要首先對本研究中的「教本」概念加以界定。

在現代的課程理論中，對於教學所用著述的名稱大體有「教材」、「教科書」、「課本」、「教本」等多個概念。

據《教育大辭典》定義：「教材是教師和學生據以進行教學活動的材料，教學的主要媒體。通常按照課程標準（或教學大綱）的規定，分學科門類和年級順序編輯。」〔註 20〕教材包括文字教材（含教科書、講義、講授提綱、圖表和教學參考書等）和視聽教材。在這裡教科書是教材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教科書的概念，據《中國大百科全書》（教育卷，1985）的解釋，是根據教學大綱（或課程標準）編定的，系統地反映學科內容的教學用書。在這裡「教科書」完全是一個現代教育學的概念，是從現代系統課程論的角度出發的定義，是有組織的教學大綱下的產物。在中國，「教科書」一詞出現和使用始於 19 世紀 70 年代。1877 年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成立學校教科書委員會，1897 年上海南洋公學編輯的《蒙學課本》三冊是近代中國最早正式出版的具有教科書體例雛形的自編教科書。在《教育大詞典》中，認為教科書亦稱「課本」、「教本」，是「師生教學的主要材料，考覈教學成績的主要依據，學生課外擴大知識領域的重要基礎。」〔註 21〕在《漢語大詞典》中，直接把教本解釋爲「教科書」。（註 22）

從眾多詞典的解釋分析，我們基本可以認定「教本」是「教科書」的另一種表達方法。由於我國古代的教育不具有現代意義的教育學體系框架，也與現代的課程論理論相去甚遠，古代官學中《詩經》教材不是現代教育學中嚴格意義的教科書。因此選用與「教科書」一詞相近的「教本」來指稱古代的官學《詩經》教材，更符合約定俗成的用法。

現有關於《詩經》教育的研究，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儒家詩教思想的研究，二是官學中《詩經》教育的研究。

〔註 20〕顧明遠主編：《教育大辭典》，（增訂合編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年 2 月，頁 695。

〔註 21〕顧明遠主編：《教育大辭典》，（增訂合編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年 2 月，頁 698。

〔註 22〕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漢語大詞典》，第五冊，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0 年，頁 446。

儒家詩教思想，一直以來都是文藝學的研究對象。作為文藝美學的重要概念，是詩歌理論的核心，與「溫柔敦厚」說、「諷諫」說一起都成為古代詩學的基本範疇。儒家詩教發軔於先秦，定尊於漢代，歷經六朝的反動，唐代的中興，至宋代開始全面的復興之勢。從教育的角度來研究詩教說的主要是臺灣康曉城的著作《先秦儒家詩教思想研究》。該書探討了詩教觀念的淵源，《詩經》的編訂與內容的教育意義；並分析了孔子、孟子、荀子的詩教思想，最後揭示了對當前文學教育的啓示。

關於官學中《詩經》教育制度和內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史類的著作中，作為經學教育的一部分進行探討。較早的研究有王鳳喈《中國教育史大綱》、陳東原的《中國古代教育》、陳青之的《中國教育史》等。解放後的《中國教育通史》、《中國教育思想通史》、《中國教育制度通史》中都有經學教育的內容。這主要集中在先秦和兩漢時期。

教育史類著作通常是在介紹孔子的「六藝」教育內容的時候，著重論述孔子的《詩》教思想，同時介紹《詩經》教材。另外，陳漢才的文章《略論孔子詩教》將孔子的詩教作為一份珍貴的教育遺產，論述了孔子的「溫柔敦厚」詩教觀，分析了詩教的形式、內容和方法，並總結了其在教育史上的重要意義。

經學教育是漢代教育史的重點內容。俞啓定先生在《先秦兩漢儒家教育》和《中國教育制度通史》（第一卷）中對漢代的《詩經》教育有專門研究和論述，且多獨到之見。他深刻分析了漢代齊、魯、韓三家《詩》的傳承與發展、毛《詩》的後來居上和成為《詩》學之首的過程，指出漢代的詩學宗旨是「詩言志」，詩在官場上有一定的實用性，但是學習《詩》的意義，主要在於陶冶性情和提高個人的文化修養，還分析了經學教育的特點、師法家法的傳授體系以及今古文經學之爭等。米靖博士論文《經學與兩漢教育》從整個經學的背景上對兩漢教育進行了研究，主要論述了經學教育合法性確立的途徑、「以經為教」的漢代教育目標和內容的變遷，以及經學教育在形成漢代社會心理和風俗上所產生的深遠影響，《詩經》教育是作為整個經學教育的一部分進行論述的。

關於漢朝以後的經學教育，研究者都將其看作官學教育的重要內容進行介紹，主要涉及官學的經學課程安排、考試制度等方面。《詩經》的教育是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不作專門研究。